◎文学聚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这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由之路。置身新时代，我们的文学尤其是地域文学有着怎样的变化？

今天的京津沪文学

采访人：**杨　鸥**（本报记者）
嘉宾：**肖复兴**（作家，居北京）
金宇澄（作家，《上海文学》主编）
武　歆（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

文学的地域性体现出文化个性的多元、丰富和生命力。地域文化影响作家的思维方式、气质脾性和审美志趣，孕育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在全球化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文学的地域性是否更加淡化？尤其在受全球化影响显著的京、津、沪地区，文学的地域性是否还能保持？本报记者近日与京、津、沪三地作家进行对话，探讨文学地域性的话题。

一方面趋同，一方面“众声喧哗”

记　者：当今的京、津、海味文学有什么特点？和过去比有什么不同？

肖复兴：当今全身心致力于京味文学创作的人并不多，影响也还不够广泛，起码还找不出一位能够和老舍先生势均力敌的作家，甚至连新时期的作家邓友梅《那五》、刘心武《钟鼓楼》、陈建功《找乐》、王朔《顽主》那样有影响的作品也不多见。当然，也有作品反映当下新生活或年轻人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远远不够，和飞速发展激烈变化的当下国际大都市的北京不相匹配。

当年能够称得上京味作家很多，不只老舍一人，张恨水等也是；不仅有小说，还有很多散文杂文，如齐如山、金受申、翁偶虹、刘叶秋等的作品。如今，无论从作家的阵势还是文体的丰富，都有很大差距。因此，以我粗浅的认知，当今京味文学还没有形成自己明显和明确的特点。

金宇澄：“海派”对于上海作者来说，一直是淡漠的，或者暧昧的，在作品中一般是浅尝即止，不形成整体清晰的取向，其中当然也有沪语不易驾驭的局限，实验的文本，即使《繁花》，也表现了一种迷惘：究竟做到怎样的饱和度，才可以归类为“海派”的文学？对于我这个作者来说，真的不清楚。

武　歆：用地理坐标来划分地域文学，并且努力找出其中的特点，这是在很长时间里文学评论家最为常用的办法。于是，便有了京味小说、津味小说和海派小说。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个作家站出来，宣称自己的创作属于哪个流派。把自己的创作归于某种流派，不是一个成熟而有理想的作家所做的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流派的产生，必须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之下，去认识去关注作品内在的精神品质。不能以某个时段、某个人或是几个人的写作方法相似或是写作题材相同，就此宣言一种流派的诞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来看“津味文学”，需要秉持更加理性、更加严谨的态度。天津拥有众多优秀作家，他们始终都在认真创作，都在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来昭示自我的存在。以这样的态势来看当下的“津味文学”，用“众声喧哗”来描述，可能是较为客观的特点。若是非要找出“津味文学”的共同点，那也就只能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都是“天津作家”。

记　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态？

肖复兴：我以为京味文学要具备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和地理这样三大元素。在全世界范围里，北京建城历史最为悠久，历史的积淀，让北京城储藏丰富的内涵；由此形成的文化，也和其他城市不一样，起码应该包括皇家、士子和平民或者叫做胡同文化这样三种，犬牙交错，相互渗透，蔓延成阵，蔚为大观。不能仅仅是人艺舞台上儿化音的京腔京韵，或豆汁儿、爆肚、炒肝儿浅表层的东西。正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文化积累以及成长背景，当今的京味文学有待提高。

金宇澄：我个人的体会，上海元素一直不那么确定。虽然上海在清末曾经形成“地域”写作的热潮，但看我们如今纳入“海派文学”的《海上花列传》，实际是非“海派”的苏白（苏州话）作品，它只表明了当时吴文化中心由苏州输入（“吴方言”以后就以“沪语”为代表了）的一种象征。虽然上海曾聚集了天南地北的作者，但地域意识，也因为这样的浑浊状态，始终是薄弱的，只意味它的开放姿态，在沪可以无拘无束，努力吸收、表达东、西方的各种样式；包括沪语的本身，也一直是在改变和不确定当中，比如上海话“我侬”（我们），到了1930年会改说宁波话的“阿拉”。上海一直是一盘散沙的习惯性表达，随后是“国语”的推进，普通话的深度推广——上海作者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语言写作，已成为一种习惯。

武　歆：“趋同”是文学创作的大敌。今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在河北省召开的关于荷花淀派的研讨会，京津冀三地作家、评论家一同参与。三地作家有一个共同认识，流派的提倡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会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被认为荷花淀派创立者的孙犁先生，从来没有宣称过荷花淀派的存在，他也从来没有认同这样的划分。因为大家都像荷花淀派，这个流派就会没有创新，就会被桎梏、就会死亡；大家都不像荷花淀派，那么也就没有这个流派，也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认为关于某种流派的划分，还是应以作家的创作观念来划分，而不是简单地以作品题材、作品风格来划分。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圆，应该是敞开的。犹如现实主义创作，其实是分为四个方面的，社会、心理、魔幻和解构，但是这四种形式又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地域魅力永在，边界或会拓变

记　者：京津沪属于受全球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色彩淡化，文学的地域性是否也有淡化？

金宇澄：地域文化，在文学而言，第一反映在语言。语言应该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读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语言，那么长期采用一种标准语，来表现不一样地域内容，容易同质化。年轻作者们的母语如只有普通话，缺少方言的托底，对于地域的、个性化的写作，在语言上无疑就是明显的损失了。此外，翻译腔以及西文写作的思维影响、“世界性的写作”的说法，也都会淡化作者的“在地性”。文学与其他艺术相比较，作者一般都不够重视作品的排他性，也是明显的一种淡化。

肖复兴：全球化会让一座城市尽快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从而融入世界，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无疑作用很大。但是，对于本土的文化却带来有弊有利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并不成正比。地域文化色彩的淡化，让城市千人一面，同时让文学书写的空间愈来愈拘谨。老北京的文化，便很容易成为老照片的一种怀旧。

武　歆：地域文化色彩淡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最简单的生活层面来看，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去了某地，早上睁开眼睛望向窗外，似乎还在原来的城市，外面的景观非常相像。不仅在国内是这样的感受，就是在国外，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不同城市的人、不同国度的人，除了语言上存有一些障碍，彼此的交流也几乎没有障碍。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地球村”。在如此氛围下，某一地区的属性特征，也就会越来越淡化了。地域文化色彩的淡化，肯定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这也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很少有人再用某个具体的地域特点来总结作家的创作特点。这种大背景对文学地域性的影响，也会相应存在，但不是绝对的，有的作家可能就会跳出这样的局限。

记　者：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地域性是否应该保持？如何保持？作家如何保持创作个性？

武　歆：文学地域性应该保持。如何保持呢？我想我们不应该以简单的地图标志来看待文学地域性。应该站在本民族的精神层面上、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上、本民族的历史上，来面对人类世界共同的审美、审丑的基点。应该把文学出生地与身体出发点区别开来，其概念不该混淆。作家的创作个性，同样来源于这样的基点。我们非常熟悉“魔幻现实主义”，但在我们印象中，不会是阿根廷，不会是哥伦比亚，而是拉美文学抑或西语文学，是南美大陆。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家的创作个性显得尤为艰难，我们既要注意“大”，也要注意“小”，不仅仅体现在写作形式上，更应该体现在作家的内心深处。拥有怎样的视角，就会拥有怎样的写作姿态。

金宇澄：全球化背景，更需要作者来表现他最熟悉的局部地域，对于现实主义的作品，局部一直是最重要的。作家能表现的，是且只能是一个局部的世界。局部的独有魅力，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肖复兴：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的地域性必须加强，才会让本土的文学创作更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文学创作，不能一味的怀旧，也不能一味的趋新。事实上，写芝加哥的索尔贝娄，写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他们的作品中都没有淡化自己的地域性特点。一部《水浒》，几百年过去了，发生那些故事的地理环境依然鲜活的存在，很多地方按图索骥，现在依然可以找到。我前面说过，京味文学所包含的三大元素，其中就有地理元素。从某种程度而言，地理或说地域性，是书写这样城市的坐标，是一部作品中另一位不说话却同样风情万种的主角。

记　者：文学地域性发展前景如何？

金宇澄：应该乐观，地域性不会被忽视，因为地域永远是那么的不同，充满了生命力，永远会吸引作者和读者的关注，无法改变。

肖复兴：我是相信发展的前景肯定是宽阔的。道理非常明确而简单，没有了地域性，京味文学便没有了书写的背景和空间，其文化历史的血液便无法在作品中流淌，人物便容易成为空心人。起码，京味文学也就不会存在了。

武　歆：未来的文学地域性的判断，绝不再是过去狭窄的某个城市、某个国度的概念，而是民族文化的大概念。将来判断一个作家或是介绍一位作家，可能会以何种语言创作为基本标准。文学地域的边界肯定会拓展。这的确需要我们具有长远的眼光。

代表走笔

开栏的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指南。为加深对报告的理解，本报自今日起开设“代表走笔”栏目，请十九大代表畅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篇为开栏第一篇。

坚定文化自信 履行文化责任

铁　凝　罗雪村　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谓文化自信，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是信念、情感，是磅礴的力量，是对过去的认同更是对未来的承担。它从五千年历史中传递下来，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炬，人们的心被这火炬所照亮，从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到舞蹈、民间文艺、摄影、书法、杂技、电视，每一个文艺领域、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都庄重地体认着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分量，都意识到沉甸甸的责任，都在认真思考文化自信之于文艺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想象这世界是由各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所形成的一片森林，中华文化就是其中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一棵大树。那些和她一起萌芽生长的树木，有多少已经停留在了时间深处，成为一株标本，而属于我们的这棵大树，栉风沐雨，历经重重灾难依然苍劲而青翠，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的文化自信，所信的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历史，是在这历史中形成、支撑着我们一路走来的传统和价值；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文化自信更是对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风神独具的美学精神的热爱、铭记和传承。中华文化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是陈列在博物馆的珍宝，更是这个时代活跃的精神脉动。以文学为例，无论是传之久远的古典文学，还是一百多年来现当代作家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复兴而书写的“新文学”，包括我们对当下中国的表现和讲述，这些书写共同构成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自信，既是依靠着我们的伟大传统，更是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坚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就是要在新时代自觉担当新使命，为人民创造文艺杰作，为人类贡献不朽作品。

仅仅三十年前，中国作家还曾经为“走向世界”而焦虑。那时候，“世界”仿佛在我们之外，在遥远的远方，我们必须奋力跋涉才能走过去。但今天，一切都不同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他们从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中，从祖国和人民的迅猛前进中获得力量、获得新的视野，变得更加自信从容。对当今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世界在远方，世界更在脚下，我们深刻意识到，越是全球化，越需要坚持民族文化的根性和本位，越需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而越具有文化自信，我们也就越加开放和包容，更强烈地认识到中国作家艺术家对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责任。

铁凝

◎新作评介

《猛虎图》展现信河街风云

韦　陇

哲贵笔下的信河街人物每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因为有了他们，信河街被鼓捣得风云激荡，地动山摇。长篇小说《猛虎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信河街人物的一次集体检阅。在小说结尾处，宇宙网络公司横空出世，代表着全新的互联网商业时代的到来，也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财富角逐游戏已经拉开了序幕。长江后浪推前浪，当陈宇宙这一代人登上信河街的历史舞台，他们又将演绎出怎样惊心动魄的传奇？他们跟随着前辈英雄们的足迹，是另辟蹊径，还是重蹈覆辙？

《猛虎图》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而我一直认为，“好小说”的标准之一是必须“好看”。哲贵作为一个敏锐的青年作家，他的“好看”绝不会只是停留在基本的技术层面。

小说不是史书，小说可以直指人心，并以内心的真实映照历史，使历史事件不再冰冷和无情，从而“津津有味”。人物以及人物内心的“真实”，则来自于客观的对待。哲贵说过，他的写作，首先要求自己对笔下的人物不带任何偏见。这句话说来轻巧，但要在写作中真正做到没有偏差，哪怕是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而言，也绝非易事。《猛虎图》中每个人物的性格既是独特的，又是多重组合型的。陈震东多智而跋扈，王万迁急进而自卑，胡长清沉稳刚毅，计化龙狡诈阴鸷，刘发展谨慎守业……这些人物性格显示出丰富性和复杂性，哲贵做到了对人物没有偏见。

《猛虎图》徐徐展开一幅群虎争雄的图画，在这里，只有力量和智慧的展示、较量、抗衡，人性的美好与丑陋，内心的黑暗与光辉，在故事的推进和交织中如影随形。

正是客观、干净的作品特质，使《猛虎图》具备了丰富性、多义性以及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这是个镜像世界。当心如猛虎的陈震东身受重创伤痕累累，在他的“心识”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老虎，包括他最好的朋友和妻子。也许，只有当陈震东驱逐了他自己心里的虎狼，才能改变他的“心识”世界，让世界回复到原来的平静、平和，乃至有可能找回另一个和风丽日、温暖如春的“镜像”。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如何善护其心，值得我们去深思。

《人民文学》杂志英文版与澳大利亚学界合作

《人民文学》杂志英文版《路灯》出版暨中澳文学交流报告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发表致辞说，《人民文学》外文版创建了与优秀译者和汉学家的良好合作模式，用最快捷的方式把中国当代很多重要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不同文字，让不同国家能比较全面、整体地了解中国当代作家的当下写作。此次《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与澳大利亚学界的合作，表明中澳文学的交流有了实际成果。

据《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介绍，从2011年创刊到今年年底，《人民文学》外文版将出版10个语种。《路灯》的出版，不仅要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更要推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等交流。《路灯》的作者既有重量级的中国最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注重一些青年作家。杂志目前正在推进落地出版，如继在美国成功实现《路灯》经典本的出版之后，也已经与西悉尼大学议定年底在澳大利亚的出版事宜。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讲师瑞秋·莫莉说，我们拿到了不同版本的《路灯》，我很高兴能够把这个杂志带回家给我的学生看。中国文学的创造力和实验性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所接触的中国文学是富有勇气、非常感人、有挑战性的文学。（蓝　文）

中俄《十月》交流开花结果

由北京《十月》杂志社、俄罗斯《十月》杂志社和首都师范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俄十月文学论坛日前在京举行。

2017年，中俄两家《十月》杂志合作，在10月号上推出专辑，以“北京故事”和“莫斯科故事”为题，组织两国作家创作多篇小说作品，互译后同时刊出。这些作品均为反映两国首都当代生活的最新小说，“北京故事”包括叶广芩的《豆汁记》、邱华栋的《蒸锅和古琴》、荆永鸣的《出京记》和晓航的《霾永远在我们心中》4部中篇；“莫斯科故事”是一组围绕莫斯科这座城市的风格各异的15个短篇。作家们让个人的生活体验与城市的演变进程相互交织，将两座城市当下的生活现实与其丰厚的历史积淀融为一体，对城与人、城与国家、城与民族历史的相互关系进行文学叙事。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俄罗斯作家的小说和我们作家的作品非常不同，不仅是城市生活不同，而且在对城市认识、对城市文化理解特别是在书写方式上有所不同。不同国家和不同城市的文学互相之间可以照亮，比如俄罗斯作家让我们看到他们关于短篇小说另外一个写法，他们同样看到中国作家对北京书写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和他们相对简单方式构成鲜明的比照，这种比照有文化差异性，同时也是我们互相发现的过程。

俄罗斯《十月》杂志主编伊琳娜·巴尔梅托娃表示，从《十月》杂志看中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有很多相似的部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对于研究中俄文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推动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中俄文学的研究。她谈到，这4位中国作家写出非常出色的中篇小说，比如叶广芩的《豆汁记》在京剧背景下，写一个女性悲剧性爱情故事，自己非常喜欢。（晓　雯）